

## 崔溥《漂海录》在朝鲜时代的流传与接受

— 以汉文资料为中心 —

肖 大 平\*

### 〈目次〉

- |                                  |                               |
|----------------------------------|-------------------------------|
| I. 绪论                            | V. 对明报恩思想与朝鲜士人对崔溥《漂海录》的接受     |
| II. 崔溥《漂海录》的刊刻以及<br>与读者接受相关的资料   | VI. 名教观念、戊午士祸与朝鲜士人对崔溥《漂海录》的接受 |
| III. 华国思想与成宗对崔溥漂海事<br>件与《漂海录》的接受 | VII. 结论                       |
| IV. 实学思想与实学家对崔溥《漂<br>海录》的接受      |                               |

### I. 绪论

崔溥(1454~1504), 字渊渊, 号锦南, 罗州人。《戊午党籍》记崔溥生平事迹如下:

崔溥, 字渊渊, 号锦南, 罗州人。博闻强记, 英杰不羈。成庙朝登第, 为弘文馆校理。奉使济州, 船为风所漂, 泊于中原浙江宁波府。边臣疑倭寇, 将杀之, 溥应对捷给得免。成庙令上行录撰《漂海录》以进。官至礼宾寺正。戊午被谪, 后竟逮被杀。<sup>1)</sup>

\* 暨南大学 博士后。

1) 许筠, 《海东野言(二)·戊午党籍》。

朝鮮成宗19年(1488年)，崔溥奉王命前往濟州。因得到在故鄉全羅道羅州的父親去世的消息，返鄉奔喪。在返鄉途中，崔溥一行43人所搭乘的船隻遭遇風暴，漂到大洋之中。經過十三日的海上漂流，最後在中國浙江台州臨海縣的牛頭山附近海域靠岸。一行人先是被明朝人誤以為是倭寇，在調查出真相後，崔溥等人被明朝官員沿著京杭大運河護送至北京，最終平安回到朝鮮。由於崔溥等人深入了中國江南地區，飽獲見聞，在返回朝鮮後，崔溥受成宗之命將自己的漂海經歷與中國見聞寫成三卷本的《漂海錄》<sup>2)</sup>一書。

韓、日、中三國學界對崔溥《漂海錄》做過很多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涉及諸多方面。然而對於崔溥《漂海錄》在各國的接受情況，從目前發表的成果來看，尚缺乏系統研究。崔溥《漂海錄》在朝鮮時期擁有大批讀者。筆者爬梳韓國文獻，對朝鮮時人閱讀與評論崔溥《漂海錄》的相關資料做過初步的收集整理，發現朝鮮時期不少人留下了有關崔溥《漂海錄》的評論文章，為我們研究崔溥《漂海錄》在朝鮮時代的接受提供了重要資料。<sup>3)</sup>

朝鮮時期有哪些人讀過崔溥《漂海錄》？又是如何接受的？學界對此關注不多。但“朝鮮時人對崔溥《漂海錄》的接受”這一課題的研究，對於深入崔溥《漂海錄》的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本文即旨在對這一問題作初步探討。先揭示朝鮮時期崔溥《漂海錄》版本的刊刻的多種樣態及讀者接受相關資料，接著從四個方面依次闡述四種不同接受者的思想立場。

- 
- 2) 《漂海錄》的命名有多種，如“漂海錄”、“漂舟錄”、“漂流記”等等。其中以“漂海錄”命名的有崔溥的《漂海錄》、張漢哲的《漂海錄》，李志恒《漂海錄》(又名《漂舟錄》)等等。本文中所述《漂海錄》特指崔溥《漂海錄》，以下不重複說明。
  - 3) 翻譯是接受的一種特殊方式，無論是朝鮮時期的諺解本還是日本江戶時期的日譯本，按理皆應納入接受研究的範疇之中。但考慮到對朝鮮時期兩種韓文譯本的研究已有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因此對譯本及譯者之接受的考察暫不納入本文研究範疇。

## II. 崔溥《漂海录》的刊刻情况与读者接受之相关资料

在考察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两个事实是:第一,朝鲜时代,崔溥《漂海录》经过多次刊刻,从目前传世藏本来看,至少经历过六次刊刻。第二,朝鲜时代,崔溥《漂海录》拥有众多的读者,有着大量的接受群体。

### 1. 崔溥《漂海录》在朝鲜时代的刊刻情况

先看第一个事实:朝鲜时期崔溥《漂海录》的刊刻与翻译情况。崔溥《漂海录》现存汉文本六种、谚解本两种、日译本两种。汉文本崔溥《漂海录》凡经六次刊刻,具体的情况如下:

初刻本:朝鲜明宗年间以甲寅字刊刻。<sup>4)</sup>该刻本韩国无全本,仅高丽大学华山文库藏残本一部,为卷一部分。不过日本东洋文库藏有此刻本的全本,此本被称为“东洋文库本”。

二刻本:朝鲜宣祖二年(1569年),平安道观察使吴祥受崔溥外孙柳希春之请求,在定州以木板刊刻。该本韩国无藏本,日本京都的阳明文库藏有全本。该本被称之为“阳明文库本”。

三刻本:宣祖六年(1573年),柳希春再次委托全罗道观察使李阳元刊刻,李阳元在李交龟、俞泓等人的帮助之下,在南原以木板再次刊刻。该本因刊刻于南原,又被称之为“南原本”。该本韩国无藏,日本神奈川县的金泽文库藏有全本,因之又被命名为“金泽文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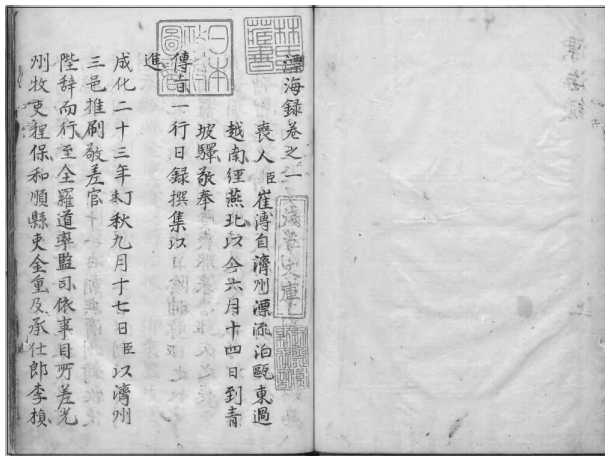
四刻本:肃宗二年(1676年)崔溥的第六世外孙罗斗春在罗州牧使李喜年的帮助之下,以木板刊行了崔溥的文集《锦南集》,其中收录了《漂海录》。现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有崔溥《漂海录》残卷,仅为卷二和卷三;

4) 朴元焄先生推测,初刻本的刊刻时间可能与《雷溪集》刊刻的中宗二十五年(1530年)相近。参照朴元焄,《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第44页。

岭南大学图书馆与北济州郡爱月图书馆皆藏卷二一册；高丽大学藏卷三一册。该本以刊刻人命名，被称为“罗斗春本”。

五刻本：英祖二年(1724年)，崔溥的第六代外孙罗斗冬，修改了罗斗春本的佚板，将《漂海录》从《锦南集》中独立出来，重新以木板刊行。该本现存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该本称之为“补刊本”或“藏书阁本”。

六刻本：高宗三十三年(1896年)，康津罗川墓阁以木活字重刊。此木活字本，高丽大学华山文库藏有全本。另外，高丽大学晚松文库藏有残本一件(仅卷三)。又，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残本一件(仅卷二)。该本称之为“华山文库本”或“木活字本”。<sup>5)</sup>



(笔者所发现之崔溥《漂海录》抄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

抄本：除了以上的六种刻本外，笔者近来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崔溥《漂海录》抄本一种。从目前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目前所提及的只有如上六种刻本，尚未有人提及这一抄本。兹将该抄本的版本情况概述如下：分上

5) 以上的整理参考了朴元焄，《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第44-46页。

中下册,上册录《漂海录》卷之一,中册录《漂海录》卷之二,下册录《漂海录》卷之三。无边框,无行线,每半页10行,行17字,小楷书写。上册第一页铃有朱印四枚,上右方朱印两枚,自右至左依次为“林氏藏书”、“日本政府图书”,第一行中下方朱印两枚,自上而下依次为“浅草文库”、“述斋衡新收记”。经研究,“林氏藏书”与“述斋衡新收记”为日本江户时期的大学头林衡(1768~1841,字述斋)的个人藏书印(试看下图)。表明该书先为林氏所藏,后为“浅草文库”与“日本政府”收藏。至于该书是朝鲜人抄本还是日本人抄本?抄录时所依据的底本为何?林衡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此书?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此书是目前所见崔溥《漂海录》中唯一的抄本,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以上我们对崔溥《漂海录》的所有传世版本作了系统的梳理。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对以上的梳理以表格形式整理如下:

序号	刊刻次第	版本名称	刊刻时间	刊刻地点	刊刻主持人	版本馆藏情况
1	初刻	东洋文库本	1530年 <sup>6)</sup>	汉阳		日本东洋文库藏全本 高丽大学华山文库藏卷一
2	二刻	阳明文库本	1569年	定州	平安道观察使 吴祥	日本阳明文库藏全本
3	三刻	金泽文库本	1573年	南原	全罗道观察使 李阳元	日本金泽文库藏全本
4	四刻	罗斗春本	1676年	罗州	崔溥第六代外 孙罗斗春	奎章阁藏卷二与卷三,岭南大学、北济州郡爱月图书馆皆藏卷二,高丽大学藏卷三
5	五刻	藏书阁本	1724年		崔溥第六代外 孙罗斗冬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全本
6	六刻	华山文库本	1896年	康津		高丽大学华山文库藏全本;高丽大学晚松文库藏卷三,藏书阁藏卷二
7	抄本	内阁文库本	不详	不详	不详	内阁文库藏三卷

6) 朴元焄先生的推测。参见朴元焄,《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上海书店出版

除了以上的七种汉文本以外，还有谚解本两种、日文译本两种。两种谚解本，一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一藏于西江大学图书馆。据李志英(音)的研究，国立中央图书馆藏谚解本的抄写年代当在1754年以后，与西江大学藏谚解本皆为18世纪中后期的抄本。<sup>7)</sup>两部抄本皆并未完全忠实于原文，而是有所省略，皆为“抄译”。第一，国立中央图书馆藏谚解本(以下称国图藏谚解本)以第一人称叙事，而西江大学本以第三人称叙事。<sup>8)</sup>第二，国图藏谚解本对原文的忠实程度高于西江大学藏谚解本，前者多见直译语气，后者少用直译语气，语言流畅度高。俞春东进一步认为，西江大学藏谚解本并非抄写人亲自翻译，而是从已经流行的谚解本中抄录成书。<sup>9)</sup>

日译本<sup>10)</sup>两种。其一为《唐土行程记》，其二为《通俗漂海录》。前者是江户时期的儒学者清田澹叟(1721~1785)于1769年的日文翻译本，由京都皇都书林出版。据朴元焄的研究，《唐土行程记》翻译时所使用的底本为东洋文库本<sup>11)</sup>，并非原文对照翻译，而是节译本。26之后的1795年，该译本改名为《通俗漂海录》行世。京都大学图书馆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皆典藏有《唐土行程记》与《通俗漂海录》。

以上我们首先介绍了崔溥《漂海录》的汉文本与谚解本、日译本的基本情况。版本的多样态存在实际上也反映了文本流传与接受的广泛程度。

## 2. 朝鲜时期崔溥《漂海录》的读者及其评论资料

我们需要明确的第二个事实是：崔溥《漂海录》在朝鲜时代有着众多的读者，并且这些读者中不少人或者征引了崔溥《漂海录》，或者留下评论文

社，2014年，第150页。

7) 李志英，〈崔溥《漂海录》谚解本异本考察〉，《国语国文学》第178辑，2017。

8) 同上。

9) 俞春东，〈新资料：西江大学藏崔溥《锦南漂海录》韩文本研究〉，《洙上古典研究》第53辑，2016。

10) 这里指的仅限于古代日译本，当代日译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11) 朴元焄，〈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字。

崔溥的六世外孙柳希春在为崔溥《锦南先生集》所作跋文中记载称：“外祖锦南先生以博学壮节名一世，漂海一录，又摹写中原之巨笔也，愿见者众。”<sup>12)</sup>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迁都北京，此后朝鲜朝天使臣的行走路线由海路改为陆路被固定下来。<sup>13)</sup>此后，朝天使与燕行使所行走的路线与活动的范围仅限于中国的北方。《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馀》等著作的传入朝鲜，引发了朝鲜社会的“江南热”，<sup>14)</sup>刺激了朝鲜人对中国江南的向往，但朝鲜官方与明朝、清朝的接触只能通过燕行使与出使朝鲜的明清使臣进行。因此中国的南方，对于朝鲜人而言，成为了一个他们既向往、同时又不甚了解的神秘地带。而崔溥因意外的漂海事件，得以深入朝鲜人难以接触到的中国南部地区，其所撰著的《漂海录》中对此有详细描写与介绍，自然受到朝鲜人的欢迎。柳希春跋文中一方面指出了崔溥《漂海录》在当时具有大量读者的事实；一方面指出了《漂海录》在朝鲜时期受到重视与欢迎最重要的原因。

朝鲜时代阅读过崔溥《漂海录》者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关于崔溥《漂海录》的文章，这些评论，按照性质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征引崔溥《漂海录》，包括引言与引事两种情况，引言指征引崔溥《漂海录》中的原文，引事指征引《漂海录》中言及的事件与事物；第二类是评论崔溥《漂海录》的文字；第三类是仅提及崔溥《漂海录》者。具体分类如下：

### 甲、征引崔溥《漂海录》者：

#### ① 引言类：

权文海(1534~1591)：经研究，发现《大东韵府群玉》中征引《漂海录》相关内容达52处，此从略。(《大东韵府群玉》)<sup>15)</sup>

12) 柳希春，《锦南先生集跋》。

13) 杨雨蕾，〈明清时期朝鲜朝天、燕行路线及其变迁〉，《历史地理》第21辑，2006，第265页。

14) 参考郑珉，〈十六、十七世纪朝鲜文人知识阶层的江南热与西湖图〉，《古典文学研究》第22辑，2002。

15) 笔者另撰有《权文海〈大东韵府群玉〉引崔溥〈漂海录〉研究》一文，对此进行了专

权鏊(1589~1671)：抄录《漂海录》原文，计2000字，此从略。(《海东杂录(一)·本朝(一)·崔溥》)<sup>16)</sup>

金声久(1641~1707)：《漂海录》云：晴日登汉拏絶顶，望西南千里外，有如一带白沙者，即白海也。(《八吾轩先生文集·南迁录下》)

金相进(1736~1811)：更考崔锦南溥《漂海录》记中国地名处。有曰某铺者，有曰某驿者。铺与驿似不同，铺只是贾肆之称。(《濯溪集·朱子诗札记》)

李圭景(1788~1856)：崔溥漂到中原。有人问鬃衣有无，答以无。曰：前李暹之来，多货鬃衣，今汝独无，真寒儒也。(《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人事篇·服食类·布帛》)

丁若镛(1762~1836)：锦南崔溥以忧服漂到中原，彼人见丧笠，怪而问之。崔答曰：“此古台笠之遗像也。”(《与犹堂全书·雅言党非(二)》)

丁若镛：锦南崔溥云：“鸭绿及难子二江，以一而分，又复合流也。”(《与犹堂全书·大东水经(其一)》)

丁若镛：崔溥云：“九连城今颓，只有旧址，又谓之婆婆堡。堡前有水，即枫浦也。又舟渡吾夜江，二水同源而分，复为一，通谓之狄江。”(《与犹堂全书·大东水经(其二)》)

柳子光(1439~1512)：崔溥自济州航海，漂到中原，有人问云：‘鬃衣赍来乎？’答曰：‘无之。’其问者曰：‘前日李暹之来，多货鬃衣，汝独无之，实寒儒也。’以此观之，济州事，无检察者，故守令等，肆行不义，无所忌惮也。(《成宗实录》卷239，成宗 21年 4月 25日)

## ② 引事类：

李睟光(1563~1628)：崔溥《漂海录》所谓在济州望见白海者，疑即此也(见《芝峯类说》卷二《地理部·海》)

---

门研究。

16) 经笔者研究，权鏊《海东杂录·崔溥》一文并非直接抄录自崔溥《漂海录》，而是抄录自权文海《大东韵府群玉》。



柳希春(1513~1577)：退而考《漂海录》，则以二日到济州。(《眉巖先生集·经筵日记·己巳》)

李惟泰(1607~1684)：尝见崔溥《漂海录》，皇朝有致贖于臣下，则其子虽在初丧，公服诣阙谢恩云。(《草庐先生文集》卷之十四《与宋英甫书》)

赵宗著(1631~1690)：臣尝见崔溥《漂海录》。溥于成宗时，以敬差官赴济州，遭父丧过海返家，遇风漂至宁波府古道外洋。孝宗皇帝招至阙庭，慰抚备至，赐溥白缁衣，红团领，黑锦衣各一袭，靴一鞮一，绿絁布二疋。郑浮等吏卒四十二人，缁衣缁袴各一袭，履一。溥等行至广宁驿，皇帝念其暑热，追赐溥生布青团领，白布衾，白缁衣各一袭，帽一靴一履一。郑浮等各赐白缁衣，小缁衣各一袭，帽一鞮一。其轸念之笃，虽慈父之于爱子，无以过之。溥等归国称说，满朝臣僚莫不动色嗟叹、感德天恩。(见《南岳集》；并见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外集》卷三十四《尊攘类·丁未传信录·请放还漂人疏》)

李时恒(1672~1736)：又崔锦南《漂海录》云：行至广宁驿，遇本国圣节使蔡寿、书状官郑而得、质正官金学起。(《和隐集》卷之八《艺文馆直提学金公墓碣铭并序》)

曹伸(1454~1529)：略述崔溥漂流经历，370字，此从略。(《諛闻琐录》)

许穆(1595~1682)：崔溥漂海东风七昼夜，至白海，其外大琉球。(《记言》卷之四十八《续集·四方(二)》)

许筠(1551~1588)：崔溥，字渊渊，号锦南，罗州人。博闻强记，英杰不羁。成庙朝登第，为弘文馆校理。奉使济州，船为风所漂，泊于中原浙江宁波府。边臣疑倭寇，将杀之，溥应对捷给得免。成庙令上行录撰《漂海录》以进。(《大东野乘·海东野言(二)》)

《成宗实录》史官：崔溥尝奉命往济州，遭风飘泊浙江，帝命遣还。中原文士见溥者，必问居正安否。(《成宗实录》第223卷，成宗19年12月24日)

对马岛致奠官金碑(?~?)、致慰官张珽(?~1508)：前者崔溥漂到上国，边将疑为海贼，争欲杀之。当时若有节钺，则何致疑虑?臣等伏愿授之节钺，以全使臣之体，鎮服悍虏之心何如?(《燕山君日记》卷13，燕山君2年3月27日)

乙、评论崔溥漂海事件及其《漂海录》者：

沈义(1475~?)：昂藏忠胆正峥嵘，生死沧溟一棹轻。点检纪行成独梦，枕边犹傍落潮声。(《大观斋乱稿》卷之三《读崔斯文溥〈漂海录〉》)

柳希春：尝奉命往耽罗。适奔父丧，为风所逆，漂到中国之台州。还至都城外，上命撰进一行日记，览而嘉之。遂俾藏于承文院。其文字卷不过三，而不惟状大洋变化，自瓯徂燕，一路山川土产人物风俗，粲然森列。(《眉巖先生集》卷之三《漂海录跋》)

南九万(1629~1711)：饱尽千危历万难，几重沧海几重山。早知不免清流祸，鱼腹藏身较似安。(《药泉集》第一《看崔溥漂海录》)

李潜(1622~1658)：杳杳耽罗外，孤帆万顷头。那知一阵颶，已到浙江秋。(《秋溪集》卷之二《题崔溥飘海录》)

金履万(1683~1758)《题锦南漂海录二首》：瓮里醜鷄核里虫，鸭江衣带限西东。一从漂海书成后，万里山川指掌中。弘治礼乐极彬彬，漂海书中拾一尘。兰台容有揄扬语，百世公言在野人。(《鹤臯先生文集》卷之三)

金履万：崔溥但记寒山钟。(《鹤臯先生文集》卷之三《诗晚稿·七言古诗》)

柳希春：外祖锦南先生以博学壮节名一世。漂海一录，又摹写中原之巨笔也，愿见者众。(《锦南集·锦南先生集跋》)

俞瑒(1614~1690)：至夫瓜亭有曲，渔父有词，漂海有录，巾车有集，皆可论其得失欤。(《秋潭集》卷之贞《策问·江山之助》17)

奇字万(1846~1916)：崔锦南漂海所录，必中州名迹，而表氏庄得与列焉。则其为名族，又可槩矣。(《松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新昌表氏族谱序》)

17) 《新唐书·张说传》载：“(说)为文属思精壮，长于碑志，世所不逮。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张说对“江山”(客观环境)对“文章”写作的积极刺激作用作了总结，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广为人传称此说。如释文珣的“幸有江山助”(《送王商公游永嘉兼呈东叟曹侍郎荆山刘学士》)，苏瞬卿的“幸有江山聊助思”(《送子履》)，“其枕藉不离图史；有江山以助文章。”(《题永明所著文集杂纂》)俞瑒从“江山”与“文章”写作的关系这一角度，评论崔溥经历九死一生、成功归还后写成《漂海录》之事，为“文章江山助”的说法提供新的例证。

金万重(1637~1692) : ……公一日来访祖父, 见壁上书唐诗“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 谓祖父曰: “曾在南京见寒山寺, 则寺在吴江上, 一小刹也, 别无奇观, 而以张继题诗有名也云, 我国人得见燕京足矣。”崔公之行, 遍观苏杭胜地, 可谓观于海者难为水也。(《西浦先生集》卷之六《西浦日记》)<sup>18)</sup>

李世仁(1452~1516) : 且崔溥《漂海录》, 自金陵至帝都, 山川、风土、习俗, 无不备记。吾东方人, 虽不目覩中原, 因此可知, 请并开刊传播。(《中宗实录》第13卷, 中宗6年3月14日)

成宗(1457~1494) : 命赐溥襦衣及靴曰: “溥跋涉死地, 亦能华国, 故赐之。”(《成宗实录》第261卷, 成宗23年1月14日)

### 丙、仅提及崔溥《漂海录》者 :

许筠: 夕, 余出橐纸二十一卷, 令印朱子书节要及漂海录。(《荷谷先生朝天记》, 万历二年甲戌六月初四日)

柳希春: 九月, 以推刷敬差官往济州。弘治戊申闰正月, 闻父丧, 荒忙渡海, 遭风漂至中国之台。六月, 回到汉阳青坡驿。承上命, 撰进漂海录。(《眉巖先生集》卷之三《锦南先生集序》&《锦南先生事实记》)

柳希春: 定州印送漂海录三册来。(《眉巖先生集》卷之八《日记·庚午》)

鱼叔权(生卒年不详) : 成化丁未, 校理崔溥以济州敬差官, 奔父丧而来。遭风漂海, 泊于台州。备倭指挥等官转送杭州, 差官伴送到京, 礼部奏准解送。(《大东野乘·稗官杂记(二)》)

赵普阳(1709~1788) : 乔桐主<sup>19)</sup>之薤獮士林也。一时文章墨本之可传于

18) 崔溥拜访金万重祖父, 谈及了自己在中国见到寒山寺的经历。金万重得知此事的途径未作交代, 不过无外乎二种: 一, 或为幼年时期在崔溥向金万重祖父谈论时自己从旁听得; 二, 或为从他人处(如其祖父处)获知。具体是何种情况, 难以考察。虽然金万重记载了崔溥在中国见到寒山寺一事, 但这并非金万重通过阅读《漂海录》而得来, 即不能因此判断金万重读过《漂海录》。不过由下文“崔公之行, 遍观苏杭胜地, 可谓观于海者, 难为水也。”这句总评来看, 金万重读过崔溥《漂海录》的可能性较大。且纳入评论《漂海录》一类资料中。

世者何限。而独崔锦南《漂海》一录之外，他无存焉。（《八友轩先生文集》卷之四《题五君子情志交孚契会图后》）

除此以外，还有数处提及崔溥与《漂海录》。但仅从文字上来看，我们难以确认除许筠与丁若镛外的其他作者是否真正读过《漂海录》，且记于此：

李龜(?~1504)：成庙令上行录，撰《漂海录》以进。（《再思堂先生逸集》卷之二）

权五福(1467~1498)：成庙令上行录，撰《漂海录》以进。（《睡轩集》卷之三）

郑希良(1469~1502)：成庙令上行录，撰《漂海录》以进。（《虚庵先生续集》卷之三）

李穆(1471~1498)：成庙令上行录，撰《漂海录》以进。（《李评事集附录》）

柳成龙(1542~1607)：成庙令上行录，撰《漂海录》以进。（《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历代要览·弘治》：济州推刷敬差官崔溥，奔父丧回来，漂到浙江台州而还。

虚白明照(1593~1661)：公以谢恩使复赴燕京作。时弘文馆校理崔溥往济州，漂泊江浙海洋港口，皇帝发运本国，凡四十三人。（《虚白堂诗集》卷十四）

许筠：成庙令上行录撰《漂海录》以进。（《海东野言(二)》）

丁若镛：我人之漂去者，若屯罗岛陪戎尉漂至崑山县，（高丽初）敬差官崔溥漂至宁波府(皇明末)是也。（《与犹堂全书》文集卷十五《叙》）

---

19) 案：指燕山君。

### Ⅲ. 华国思想与成宗对崔溥漂海事件及《漂海录》的接受

“文章华国”思想是朝鲜时期对明外交的一个重要思想,“朝鲜时代‘文章华国’的主要形态是与明朝使臣的唱和。”<sup>20)</sup>迎接明朝使臣的远接使、从事官、馆伴等官员的任命,尤其是远接使的任命十分重要。他们既要承担明使的迎送任务<sup>21)</sup>,比起迎送与陪同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唱和使臣的诗作。这些唱和之作,既是一种文学交流,更是一种外交活动。朝鲜人的唱和诗作发挥着“文章华国”的功能,因此,历来朝鲜国王都十分重视朝鲜接待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如世宗时期,艺文馆提学尹准、同知摠制申樞向世宗申奏希望“于初场之疑,代以八角;中场之论,代以古赋”<sup>22)</sup>以培养“文章华国之士”。<sup>23)</sup>再如成宗时期,俞好仁有“华国之才”,在丁忧欲还乡之际,其好友左副承旨权景祐向成宗报告此事,成宗称:“好仁华国之才也,不可许归也。”<sup>24)</sup>可见成宗对“华国之才”的重视。又如燕山君1年,明使王献臣出使朝鲜,4月18日义州宣慰使许琛在向燕山君上奏的启文中称:“接遇上国使,非华国之才,不能堪。”许琛以自己“素未识礼,又乏词华,岂宜冒忝,请辞。”<sup>25)</sup>表明了对接待使臣的文学才华重要性的认识。再如燕山君于1504年11月为了促进“文章华国”,推行

20) 沈庆昊,《朝鲜时代的汉文学与诗经论》,一志社,1999年,第37页。

21) 包括明使自鸭绿江入境后,从义州迎接伴至汉阳;在明使完成出使任务离开时,又从汉阳护送至鸭绿江岸;此外,在明使滞留汉阳期间,以远接使为首的朝鲜接待团还需全程陪同明使臣参观汉阳境内的汉江、杨花渡、成均馆等处。

22) 案:初场试四书疑,中场试论。

23) 《世宗实录》第52卷,世宗13年4月12日载:艺文馆提学尹准、同知摠制申樞等启:“表笺文字,事大切务。我朝初学之士,专业疑义论策,不知对偶声律之文,及至老大,骨骼既成,不知下字之法。前朝取士之制,虽不可取,然试以八角、古赋,故人人自幼兴起对偶之风,文章华国之士辈出。窃见今日初场试四书疑,中场试论,举子多不致力,一人成篇,诸辈劾之,似违国家作成之义。臣等切望于初场之疑,代以八角,中场之论,代以古赋,庶几开趋向之路,期后日之效。”命下礼曹,与详定所同议以启。

24) 事见《成宗实录》第286卷,成宗25年1月16日。

25) 事见《燕山君日记》第4卷,燕山1年4月18日。

以律诗三首选拔人才的主张。“因下御书曰：一等一人崔世节，二等一人郑百朋(等)，三等二人俞汝霖、郑绍宗，四等十五人。试律诗四韵以取士，幼小初学之辈多与焉。”<sup>26)</sup>朝鲜历朝君臣对“文章华国”以事大十分重视，限于篇幅这里仅列举以上关涉世宗、成宗、燕山君朝相关几例作了说明。

崔溥虽然不是以使臣身份出使明朝，但在明朝滞留期间，多次展现出朝鲜“礼仪之邦”的形象，赢得了明朝人的认可与称赞。如：崔溥在中国境内，每逢明朝人以酒肉款待时，皆以在服丧期间推辞<sup>27)</sup>；在护送官将崔溥一行护送至北京、拟觐见明朝皇帝时，即使明朝官员劝崔溥暂且从权、更换吉服，崔溥也坚持穿着丧服见面。<sup>28)</sup>诸如此类坚持礼节的事例还见于多处，与崔溥接触的明朝人皆给与了很高的评价。如《漂海录》中记载：“有御史三大人来钱于船上，邀臣至前，遇以礼，语臣曰：‘你是礼义国好人，我诸大人相敬你。’”称崔溥是“礼义国好人”，崔溥因坚守礼仪，赢得了明朝人的尊敬。

崔溥于成宗19年(1488年)6月14日回到朝鲜，6月22日完成《漂海录》的撰写。<sup>29)</sup>四年之后的成宗23年1月14日，成宗再次召见了崔溥，向崔溥询问四年前漂流中国的事件以及所见中国江南的情况。《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记载了成宗与崔溥的对话：

上御宣政殿，引见崔溥问漂流时事。溥对曰：“臣于戊申正月在济州，闻父丧，遑遽渡海，夜泊草兰岛，北风忽起，随涛上下，漂至中国宁波府界……臣自此乘轿行，过十日余程，始乘船，遂至帝都。帝赐衣一袭，竝给衣袴。还

26) 事见《燕山君日记》第56卷，燕山10年11月23日。

27) 崔溥《漂海录》：十八日。乙源恻然，即呼酒劝臣。臣曰：“我朝鲜人守亲丧，不飲酒食肉茹葷及甘旨之味，以终三年。蒙饋酒，感恩则已深矣。然我今当丧，敢辞。”乙源遂饋臣以茶，饋从者以酒。

28) 崔溥《漂海录》：右侍郎张之命谓臣曰：“明早引入朝，给赏衣服，可易吉服，事毕便打发回去。”臣对曰：“我漂海时，不胜风浪，尽撒行李，仅守此丧服来，无他吉服。且我当丧即吉，恐不合于礼。”

29) 《朝鲜王朝实录》第217卷，成宗19年6月22日记载如下：前校理崔溥撰进中朝闻见日记。承政院金啓曰：“崔溥今毕撰日记，欲奔父丧，请给马以送。”传曰：“可，且予见日记，可谓凄怆。其赐赙布五十匹。”

到广宁，大人赠衣一裘曰：‘为殿下与之。’上又问民居城郭、男女衣服。溥曰：“大江以南，苏、杭之间，巨家大屋，连墙栉比；大江以北至帝都，人烟不甚繁盛，间有草庐，官府之城，亦皆高筑，城门之楼，或有二层、三层者。门外皆有拥城，拥城之外，又有粉墙凡三重，男女衣服，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袴，女皆左衽。宁波府以南，妇人首节圆而长；宁波府以北，圆而锐。”命赐溥襦衣及靴曰：“溥跋涉死地，亦能华国，故赐之。”<sup>30)</sup>

根据《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可知，成宗最起码先后三次赏赐了崔溥：第一次是在1488年6月22日，崔溥刚从中国回到朝鲜，获得成宗赏赐“米豆若干及贖物”；第二次是在完成《漂海录》的写作、离京返乡之际的6月22日，获得了“布五十匹”的赏赐；第三次是在崔溥回到朝鲜的第四年1492年(成宗23年)1月14日，在听取了崔溥的漂流经历后，再次赏赐了崔溥“襦衣及靴”。崔溥在1489年6月14日返回朝鲜、面见成宗时，成宗与崔溥之间必然有一段关于崔溥漂海经过与中国见闻的对话，为何在4年之后又再次专门召集崔溥问及此事？其中原因我们暂且不去深究，这里要关注的是成宗对崔溥漂海事件与《漂海录》的态度与评价<sup>31)</sup>：“跋涉死地，亦能华国，故赐之。”崔溥虽然并非以使臣身份出使明朝，但同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与迎接出使来朝明朝使臣的朝鲜官员一样，同样发挥了“华国”的作用。换言之，朝鲜国王成宗对崔溥漂海事件及其《漂海录》的接受是从“华国思想”出发的，崔溥因“以礼华国”赢得了成宗的肯定。

事实上，在崔溥之前6年(1482年)同样漂到中国的李暹在返回朝鲜后，成宗亦给予了类似的评价。《成宗实录》14年9月5日载：

司谏院献纳杨沔啓：“李暹超资迎接都监郎厅，陞职·加资不可事。”传曰：“李暹漂流他境，能随机应变，得免其死，与中朝之人，相唱和其诗，虽

30) 《成宗实录》第261卷，成宗23年1月14日。

31) 虽无材料直接证明成宗阅读过《漂海录》，但成宗阅读过的可能性可由两个方面事实推知：第一，崔溥撰述《漂海录》是奉成宗之命撰写；第二，由成宗对崔溥漂海事件的评述“溥跋涉死地，亦能华国”来看，成宗对《漂海录》中所记崔溥以礼“华国”相关事件应该是熟悉的。

不足称，然名为武臣，而言论诗章如是，可谓华国之臣矣。且迎接都监郎官，陞职、加资，已语天使，不可更改。”<sup>32)</sup>

崔溥在返回朝鲜后，未能即刻返乡奔丧，而是滞留在京城撰写《漂海录》达8日之久。因此遭到司谏院与司宪府的数次弹劾，认为崔溥“不即奔丧”、“大节已失”、“得罪于名教大矣”，而成宗及承政院官员却对崔溥多次袒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成宗看来，无论是李暹罗的漂流中国，还是崔溥的漂流中国，皆发挥了“华国”的作用。这是成宗看待崔溥漂海事件与《漂海录》的基本出发点。

#### IV. 实学思想与实学家对崔溥《漂海录》的接受

壬辰倭乱与丙子胡乱之后，朝鲜鲜王朝由盛转衰。壬、丙两乱造成朝鲜王朝民生凋敝、国力衰減，朝鲜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同时在思想领域，随着14世纪传入朝鲜的朱子学在朝鲜后期的失势，代表地主改革派的实学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从传统的性理学中发掘出其所隐藏的实学根基，同时吸收从中国传入的明清实学思想以及从西方传入的“西学”思想，逐渐确立起朝鲜的实学思想。朝鲜后期兴起的实学，具有“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近代指向”的启蒙意识、放眼世界的开放意识等多方面的特点。<sup>33)</sup>一般将朝鲜实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7世纪始，在朝鲜王朝由盛转衰的背景中，实学开始萌芽。这期间的代表人物有李晬光、金堉、柳馨远、梁得中等人。第二阶段：自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这一时期形成了等各种不同派别的实学流派，朝鲜实学迎来鼎盛时期。这阶段的代表人物有：以星湖李瀾为代表的的经世致用派(星湖派)，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为代表的利用厚生派(北学派)，以及以金正喜为代表的的实事求是派(学

32) 《成宗实录》第158卷，成宗14年9月5日。

33) 葛荣晋主编，《韩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斋实学派)。第三阶段：19世纪初期至中期。实学家们由古典实学向近代开花思想转变，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实学家有崔汉绮、朴珪寿等人。<sup>34)</sup>

与传统的“性理学”最大的不同是，实学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宗旨，不再“坐而论道”，而转向重视实务、重视知识的实用性。同时在知识的追求上，表现出严谨的考证学风与对广博知识面的追求。

17世纪的实学家李睟光、18世纪的李圭景与丁若镛等人皆是朝鲜实学史中代表性人物。李睟光著有《芝峰类说》一书，该书包罗万象，涵盖天文、地理、君道、官职、儒道、经书、文章、人物、技艺、宫室、服饰、食物、草木、禽虫等25部共计3435各条目，另外还收录文献348种、人名2265名。博采众长成一家之言，被认为是朝鲜第一部重要的实学著作。

18世纪的李圭景著有《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一书，该书规模庞大，全书60卷，收录历数、种族、历史、地理、文学、音韵、宗教、书画、风俗、冶金、兵法、草木、花鸟、鱼虫及典故等各领域的条目达1400余种；不仅如此，编者还对各条目旁征博引、精细考证源流，形同百科全书。

与李圭景同时代的实学家丁若镛著有《与犹堂全书》，全书500余卷，书中收录的《经世遗表》《牧民心书》等著作具有实学思想的光辉，对朝鲜近代思想的形成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丁若镛也被认为是朝鲜实学史上的集大成者。

在以上所列举的17世纪的李睟光、18世纪的李圭景、丁若镛三位实学家也是崔溥《漂海录》的读者，在其文集中皆留下了与崔溥《漂海录》有关的文字。三位实学家对崔溥《漂海录》的接受方式基本一致，即重视崔溥《漂海录》的知识性，在著作中多次引用《漂海录》中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涵盖地理、服装、城池等多方面。

34) 以上对朝鲜实学发展分期的观点，参考了葛荣晋主编，《韩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3-40页，2002。

### 1. 李睟光《芝峯类说》引崔溥《漂海录》考证“白海”

李睟光(1563~1628)《芝峯类说》卷二《地理部·海》一文中引用《异闻录》《夷坚志》《十洲记》《山海经》《列仙传》《輿地胜览》等文献，分别对“西海”、“宁海县东海中之尾闾”、“碧海”、“渤海”、“潮汐”等有关“海”的几个概念进行了考证，最后引用崔溥《漂海录》对崔书中所提及的“白海”所在的位置进行考证，考证文如下：

尝见暹罗国地图，则东南海中，有万里长沙，万里石塘，连瓦回抱。崔溥《漂海录》所谓“在济州望见白海”者，疑即此也。<sup>35)</sup>

崔溥《漂海录》中写道：“济州父老云：‘天晴日登汉拏山绝顶，则遥望西南绝域海外，若有白沙汀一带者。’以今观之，非白沙，乃望此白海而云也。”<sup>36)</sup>在李睟光看来，崔溥《漂海录》中所谓的“白海”与李睟光曾在暹罗国地图中见到过的“连瓦回抱”的“万里长沙、万里石塘”为同一事物。

关于崔溥《漂海录》中所谓“白海”，稍晚之后的金声久在《八吾轩先生文集》中记载道：“《漂海录》云：‘晴日登汉拏绝顶，望西南千里外，有如一带白沙者，即白海也。’《南槎录》云：‘所见满目，皆成银界，不知何处为白海。’此论诚然。”<sup>37)</sup>亦对“白海”的位置予以了关注，不知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李睟光的影响。

### 2.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引崔溥《漂海录》考证“鬃衣”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人事篇·服食类·布帛》中对以“牛马鬃鬣，或织而为冠巾绣黼”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说明：

35) 李睟光：《芝峯类说》卷二《地理部·海》。

36) 朴元焄：《崔溥《漂海录》校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9页。

37) 金声久：《八吾轩先生文集》卷之六。

牛马鬃鬣，或织而为冠巾绣鞣。杨慎《丹铅总录》《后汉书·光武纪》诸于“绣鞣”注云：半臂也。又云：“字书无鞣字，当作褊。”我东俗所谓“挂背”者也。成宗二十一年庚戌，命禁鬃衣。特进官柳子光啓曰：济州守令织造鬃衣，马尾与鬣，由此剪尽。崔溥漂到中原，有人问鬃衣有无？答以无。曰：前李暹之来，多货鬃衣，今汝独无，真寒儒也。其无忌惮可知。<sup>38)</sup>

李圭景所谓柳子光所启之事见于《朝鲜王朝实录》。《朝鲜王朝实录》所载柳子光的“启”文中亦引用了崔溥《漂海录》中有关“鬃衣”的内容。<sup>39)</sup>

### 3.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中引崔溥《漂海录》考证诸条目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中引崔溥《漂海录》相关条目四处：

一，在列举中国与朝鲜两国之间的漂流民时，将崔溥漂流到浙江宁波府事件作为“我人之漂去者”之一例。《与犹堂全书》中写道：“我人之漂去者，若屯罗岛陪戎尉漂至崑山县，(高丽初)敬差官崔溥漂至宁波府(皇明末)是也。彼人之漂来者，若平章事火尼赤来泊铁岛，(元人也)郑臣保漂至瑞山，王可臣漂至殷粟，(仁祖朝)是也。”<sup>40)</sup>

二，在对“丧笠”进行解释时，以崔溥《漂海录》中有关“丧笠”的内容为例。《与犹堂全书》中写道：“丧者，别有丧笠，名之曰方笠。(其形正圆，状如荷叶，不可曰方)锦南崔溥以忧服漂到中原，彼人见丧笠，怪而问之。崔

38)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人事篇·服食类·布帛》。

39) 《成宗实录》第239卷，成宗21年4月25日有如下记载：丁未，御经筵。讲讫，……特进官柳子光啓曰：“臣窃闻济州，距京絶远，王化所未及。其守令等，多行不法，织造鬃衣，由是马尾与鬣，剪取殆尽。崔溥自济州航海，漂到中原，有人问云：‘鬃衣贵来乎？’答曰：‘无之。’其问者曰：‘前日李暹之来，多货鬃衣，汝独无之，实寒儒也。’以此观之，济州事，无检察者，故守令等，肆行不义，无所忌惮也。”上顾问左右。领事尹弼商对曰：“子光之言，果然。世宗朝，济州守令，以六寺七监判事择差，及其递时，考其行事，虽未能大治，如无过失，必陞堂上官，由是人皆谨守其职。今亦兼差监牧，纠察不法，则庶无猥滥之弊。”上曰：“鬃衣一禁可也。兼监牧设立事，考啓。”

40)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文集卷十五《叙》。

答曰：‘此古台笠之遗像也。’《漂海录》中原文如下：“(二十日在桃渚所)华<sup>41)</sup>与一官人来看臣，指臣笠曰：‘此何帽子。’臣曰：‘此丧笠也。国俗皆庐墓三年，不幸如我漂流，或不得已有远行者，则不敢仰见天日，以坚泣血之心，所以有此深笠也。’”

三，对“兰子江”与“鸭绿江”的关系进行说明时，引用了崔溥《漂海录》中的相关记载。《与犹堂全书》中写道：“兰子洲周回二十五里，水落则连陆。(威化岛之北)倪谦《使朝鲜录》曰：‘兰子江，俗名鮎鱼江，即鸭绿江之支流。’锦南崔溥云：‘鸭绿及难子二江，以一而分，又复合流也。’(难子即兰子)。”崔溥《漂海录》中写道：“初四日：渡鸭绿江.....又舟渡难子江，二江亦以一而分，下又合流。”

四，引用《明史·朝鲜传》《盛京通志》《一统志》《金史》中有关凤凰城外之“九连城”的相关文献记载之后，接着引用了崔溥《漂海录》中有关“九连城”的记载。《漂海录》中记载崔溥一行人于六月初四日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踏上故乡朝鲜的领土。在抵达鸭绿江之前，经过“九连城”，《漂海录》中写道：“至九连城。城颓，只有土筑旧址。又谓婆婆堡。堡前有江。即枫浦也。又舟渡吾夜江。二江同源而分。复合为一。通谓之狄江。”《与犹堂全书》中转引《漂海录》中有关“九连城”文字如下：“崔溥云：‘九连城今颓，只有旧址，又谓之婆婆堡。堡前有水，即枫浦也。又舟渡吾夜江，二水同源而分，复为一，通谓之狄江。’”文字基本相同。

以上我们对李晔光《芝峰类说》、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以及丁若镛《与犹堂全书》中引用崔溥《漂海录》中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从李晔光、李圭景、丁若镛三人著作中对崔溥《漂海录》的引用中，我们看不到三人对崔溥及其《漂海录》的任何主观性评价，三人只是在其著作中对崔溥《漂海录》中相关内容作了客观性的引用。所引用崔溥《漂海录》中的内容，多侧重于《漂海录》的地理、服装、城池等知识性内容。换言之，三位实学家将崔溥《漂海录》活用作编纂“百科全书”的资料，这也侧面反映了崔

41) 指桃渚所千户陈华。

溥《漂海录》一书的知识性、资料性与实用性。

## V. 对明报恩思想与朝鲜士人对崔溥《漂海录》的接受

康熙六年(1667)5月25日,来自福建的商人林寅观、陈得等九十五人在搭乘船只“往日本国笼仔沙箕贸易”途中遭遇风浪,船只漂流到朝鲜济州岛大静县海域。此次漂流事件先后经由大静县猊来里浦座主金耽仁、大静县监安塾、济州牧使洪宇亮、全罗道观察使洪处厚逐级上报朝鲜王庭。一行人在大静县获得救助后,虽然林寅观等漂流民向朝鲜官方提出送还日本或归化朝鲜的请求,但最终遭到了拒绝,最后被押送回清。虽然在接受朝鲜方面的“问情”时,对于乘船出海的目的回答是为“往日本国笼仔沙箕贸易”,但林寅观等清朝漂流民携带有《永历二十一年大统历》,被朝鲜人视之为明朝遗民,认为漂流民之漂来朝鲜实为“传信”,即传晚明朝廷之信。而彼时清朝虽已天下初定,但反清复明活动仍然持续不断。因此,来自清朝、传晚明之信的林寅观等九十五位漂流民的处置问题,对于朝鲜而言十分棘手。

一方面,在壬辰倭乱与丁酉再乱时,明朝先后两次派兵援朝,击败丰臣秀吉率领的日本侵略军。因之,朝鲜认为明朝对于朝鲜有“再造藩邦”之恩。笃信儒学的朝鲜士人基于报恩思想,言辞激烈地反对将具有浓厚的“明朝遗民”色彩的漂流民送还清朝。而朝鲜王庭基于朝鲜与清朝两国邦交的立场,选择了移交漂流民。此事件引起当时朝鲜士人心灵极大的震动。不少文人写下言辞激烈的反对移交漂流民的文章,以及对漂流民的不幸表示同情的诗作。如成海应《丁未传信录》中对于此次漂流民处置事件相关文书、以及文人们写作的与之相关的诗文作了全面收集。

《丁未传信录》收录在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外集》卷三十三与卷三十四中。《丁未传信录》分为咨文、问答以及诗文三部分。咨文部分收录与漂流民的处理相关文书四件:《驰报汉人林寅观等漂来事情咨文》《解送漂海人口咨文》《计开》《搬送漂海人留真红衣袍咨文》。问答部分先后收录李野

叟素翁<sup>42)</sup>、阙名、柳世翊、金宅三、李敏迪、闵徽继、汉人黄功等人与漂流民的问答七篇。诗文部分先后收录《漂人诗》《林寅观等投书》《林寅观从人投示耽罗书》《漂人在弘济院投书》《漂人投诗》《宋子大全九则》《李端相静观斋集六则》《赵宗著南岳集二则》《洪命夏沂川集二则》《赵根损菴集一则》《闵徽继湖巖集一则》《韩元震南塘集一则》《李畚睡谷集一则》《申愈集二则》《李宜显陶谷集一则》《思汉编四则》《李志述上家庭书一则》《权遂菴集二则》《李陶菴集一则》《郑澹丈巖集一则》《恩恤》《后录》以及《附：公山倅李泰渊、南京使臣黄杰等问答》等诗文多篇。

成海应《丁未传信录》中收录了赵宗著《南岳集》中的两则疏文，其一《请放还漂人疏》中就提到了崔溥的《漂海录》：

.....今之议者以为仁祖既已从权而屈己，则今日之缚送华人，不至大害于义。臣则窃以为不然。仁祖之屈己，出于万分不得已。虽使神宗皇帝冥冥之灵闻之，想必无愧于仁祖。至于今日之事，非不得已为之者，而反以屈己之说借口。欲赞君父以不义之举，此乃诬仁祖而误殿下也，甚矣议者之不忠不智也。臣嘗见崔溥《漂海录》。溥于成宗时，以敬差官赴济州，遭父丧过海返家，遇风漂至宁波府古道外洋。孝宗皇帝招至阙庭，慰抚备至。赐溥白缁衣，红团领，黑锦衣各一袭，靴一鞮一，绿絺布二疋。郑浮等吏卒四十二人，缁衣缁袴各一袭，履一。溥等行至广宁驿，皇帝念其暑热，追赐溥生布青团领，白布衾，白缁衣各一袭。帽一靴一履一。郑浮等各赐白缁衣，小缁衣各一袭，帽一鞮一。其轸念之笃，虽慈父之于爱子，无以过之。溥等归国称说，满朝臣僚莫不动色嗟叹，感德天恩。孰谓才过百年，华人漂到其地，而反欲束缚之拘囚之，以投帛狼之口乎？揆以天理人情，胡可忍此？夫人以大德施我之，以大怨报之，则不仁之事，孰甚于此？殿下亦观夫祖宗以来，大明之施我国者何如？而丙丁以后我国之报大明者何如也？无一毫报恩之事。岁岁年年，惟以背负戕伐为事。则我国君臣每念斯事，惭膺罔极，若无所容于天地之间。虽然既往之事，皆出于万万不得已，则天地神祇犹或恕之。奈何复为此举，以增罪戾乎？.....<sup>43)</sup>

42) 即이인(李(土+寅))。

43) 见赵宗著《南岳集》，又见成海应《丁未传信录》。

赵宗著(1631~1690),《纪年便考》载其小传云:“赵宗著,重吕子,字褻叔,号艮斋。晚居终南下,改号南岳。七岁能属文。显宗己酉除教官,壬子登别试,歷三司,春坊铨郎,陞通政室。明人林寅观之缚送于燕也,奋笔草疏数千言,极陈其不可,且具别纸计策。肃宗庚午卒,年六十。”<sup>44)</sup>在反对将林寅观等人“缚送于燕”一事上,赵宗著是最为强烈的一个。在他人看来,“今日之缚送华人,不至大害于义”,而赵宗著却认为“不然”。赵宗著在疏文中将崔溥于1488年漂流到明朝浙江境内受到明朝皇帝与明人的优待,与当下漂来朝鲜的中国漂流民被“缚送于燕”的待遇进行对比。赵宗著云:“夫人以大德施我之,以大怨报之,则不仁之事”,认为将林寅观等“明遗民”移送至清,是以怨报德,是“不仁之事”。文中详细的陈述了崔溥在面见到明孝宗皇帝时、以及踏上返回朝鲜行程之前,孝宗皇帝先后两次对崔溥及其同行人的赏赐。赵宗著对于“缚送于燕”之事提出反对意见的思想基础,笔者以为有二:一是基于尊明反清的思想;二是基于报恩思想,而这两者又是互相交织的。

成海应虽然并无关于林寅观漂流事件的直接评论文字,但他将前人关于此事的诗文收集起来、编成《丁未传信录》一书的行为,已经表明了成海应的态度。又,他将赵宗著的这篇疏文不计篇幅全文收录在《丁未传信录》中,也侧面反映了成海应对崔溥《漂海录》的接受应该是与赵宗著的态度是一致的。

## VI. 名教观念、戊午士祸与朝鲜士人对崔溥《漂海录》的接受

崔溥在返回朝鲜后,先是因“不即奔丧”、留京撰著《漂海录》而遭到司諫院与司宪府官员的弹劾。十年之后,爆发戊午士祸,又因收藏金宗直《佔占毕斋集》受到牵连,被杖责并流放端川。南九万《看崔溥漂海录》与金履万《题锦南漂海录二首》等诗作中对崔溥《漂海录》的接受,是与崔溥从中国返回朝鲜后的以上两种遭遇结合起来进行的。以下先述崔溥返回朝鲜后的

44) 参照《纪年便考》甲寅十五年载“赵宗著”条。

两种遭遇，次述南九万与金履万诗歌中对崔溥及其《漂海录》的接受。

### 1. 司谏院及司宪府对崔溥的四次弹劾

崔溥《漂海录序》载：“丧人臣崔溥自济州漂流，泊瓠东，过越南，经燕北，以今六月十四日到青坡驿。敬奉传旨，一行日录，撰集以进。”<sup>45)</sup>柳希春《锦南先生事实记》载：“丁未，陞副校理。九月，以推刷敬差官往济州。弘治戊申闰正月，闻父丧，惶忙渡海，遭风漂至中国之台州。六月，回到汉阳青坡驿，承上命撰进《漂海录》。”崔溥在回到朝鲜后，奉成宗之命，撰著《漂海录》，因而未能第一时间返回故乡罗州奔丧。为撰著《漂海录》，自6月14日成宗命崔溥撰著《漂海录》始<sup>46)</sup>，至6月22日崔溥完成《中朝闻见日记》(即《漂海录》)的撰写、获得成宗许可返回罗州<sup>47)</sup>，前后花去8天时间。即，崔溥是在回到朝鲜的八天之后，方才踏上返回故乡罗州之路。其撰著《漂海录》在前，返乡在后。因此，以司谏院谏官与司宪府官员为代表的朝中官员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崔溥“不即奔丧，其大节已失”，对崔溥进行弹劾。《锦南先生事实记》中写道：“谏官以前日初丧应命撰录为过而驳之。”根据《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自成宗23年1月5日司谏院正言赵珩首次对崔溥进行弹劾以来，截至成宗24年4月13日持平尹璋对崔溥进行弹劾，朝鲜王朝谏官前后对崔溥进行过4次弹劾。具体如下：

第一次弹劾：成宗23年1月5日，司谏院正言赵珩。《成宗实录》记载：

正言赵珩来啓曰：“崔溥曾遭父丧，漂到上国，多制诗章，其制诗盖为求  
 生道，犹之可也，及还本国，虽有撰日记之命，当上书陈哀，亟归宾侧，乃累

45) 朴元焄，《崔溥〈漂海录〉校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1页。

46) 《成宗实录》第217卷，成宗19年6月14日记载：前校理崔溥还自京师，寓青坡驿，命撰进日记。

47) 《成宗实录》第217卷，成宗19年6月22日记载：前校理崔溥撰进中朝闻见日记。承政院金啓曰：“崔溥今毕撰日记，欲奔父丧，请给马以送。”传曰：“可。且予见日记，可谓凄怆。其赐贖布五十匹。”



日留京，从容撰记，殊无哀痛之心，有愧名教，以此驳不署耳。”传曰：“予欲知溥艰关道途，所闻所见，使撰日记，溥承命不得已为之，谏院何发此议？”

第二次弹劾：成宗 23年1月9日，司谏院正言李继孟。《成宗实录》记载：

司谏院正言李继孟来启曰：“崔溥在初丧，方寸乱矣。虽有上命，何至淹留，从容撰述乎？朝臣往见，无不迎接，历陈所见，略无哀痛之心，其得罪于名教大矣。安可以持平之任，授此人乎？”传曰：“其撰进日记，非忘哀也。但迎接朝臣，予不得知，今尔等以为不可，故递之。”

第三次弹劾：成宗 24年4月11日，司宪府持平李宗准。《成宗实录》记载：

司宪府持平李宗准来启曰：“……臣等又闻，弘文馆校理崔溥为济州敬差官，闻父丧出来，海中遭风，漂到中原，及致我国留连，不即奔丧，其用心可知矣，不合经筵官。”传曰：“崔溥之还，我欲知中原事，命撰日记以进，故留连耳，非忘哀而不奔丧也。溥有才，于弘文馆甚合，其勿复言。”

第四次弹劾：成宗 24年4月13日，司宪府持平尹璋。《成宗实录》记载：

持平尹璋启曰：“崔溥虽承君命，方在哭奠之中，逗留至八日，不即奔丧，其大节已失，虽外官不可用也，而况于近侍乎？”上问左右。领事尹弼商对曰：“此非平常事也，以君命留连耳。”璋曰：“修日记只一，二日事，至留八日，而不奔丧，与朋友对话自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溥不能尽孝于亲，其能尽忠于君乎？”上曰：“若接待朋友则果非矣，可递本职。”

以上四次对崔溥的弹劾来自司谏院与司宪府官员：司谏院正言赵珩、司谏院正言李继孟、司宪府持平李宗准、司宪府持平尹璋。对崔溥的弹劾，从

其返回朝鮮的翌年成宗23年1月5日截至24年4月13日，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在司諫院与司宪府官员看来，崔溥“逗留至八日，不即奔丧，其大节已失”，“累日留京，从容撰记，殊无哀痛之心，有愧名教”，“得罪于名教大矣”。以此为理由，对于向崔溥授予“持平”之任、以及任命其为经筵官，持反对态度，甚至主张撤其职位(“可递本职”)。

不过，成宗与除司諫院与司宪府之外的其他大臣(如承政院官员)并不支持这一弹劾。《朝鲜王朝实录》中对于肯定崔溥一派的意见亦作了记载，兹略举数例以窥其一斑。如《成宗实录》23年1月5日记载成宗在听到司諫院正言赵珩的弹劾上奏后，称：“予欲知溥艰关道途，所闻所见，使撰日记，溥承命不得已为之，諫院何发此议？”认为崔溥是“承命不得已为之”，并对于司諫院的弹劾表示不可理解。再如《成宗实录》23年1月7日记载，崔溥因为司諫院弹劾难以履新。成宗在听完司宪府掌令杨沔对此事的报告之后，称：“宪府之言是矣。崔溥漂泊至扬州而予命撰进日记，諫院以为虽有君命，当辞以追撰，急奔父丧，此大不然，虽在丧中，君命岂敢违乎？”认为司諫院的弹劾“大不然”。大概是因为朝中大臣围绕此事议论纷纷、争执不下，成宗又于23年1月14日(即崔溥返回朝鲜三年半后)，再次召见崔溥，询问漂流始末。在听完崔溥的汇报之后，成宗赏赐了崔溥(“命赐溥襦衣及靴”)。并对崔溥漂海一事高度评价，认为：“溥跋涉死地，亦能华国，故赐之。”<sup>48)</sup>又，《成宗实录》24年4月11日记载，成宗在听取完司宪府持平李宗准的弹劾崔溥的意见之后，称：“崔溥之还，我欲知中原事，命撰日记以进，故留连耳，非忘哀而不奔丧也。溥有才，于弘文馆甚合，其勿复言。”<sup>49)</sup>驳斥了李宗准的弹劾，并同意让崔溥入弘文馆任职。《成宗实录》24年4月12日又载，成宗令承政院针对崔溥事进行专门讨论。从《成宗实录》的记载来看，承政院官员亦不认可司諫院的弹劾，而与成宗的态度一致。《成宗实录》24年4月12日有如下记载：

48) 《成宗实录》第265卷，成宗23年5月25日。

49) 《成宗实录》第265卷，成宗24年4月11日。

传于承政院曰：“崔溥事，议吏、兵曹以啓。”吏曹判书洪贵达等议：“溥承命撰日记，未得遽归，非故留也。”兵曹判书韩致亨等议：“溥在济州，闻丧即奔，因风漂泊大洋，九死十生，仅达中土，自南京抵燕都，水陆万里，艰苦万状，得还本国，闻丧日月已久，与初蹙踊之际有间，况承命撰日记，其情可恕。”传曰：“溥远达中土，备尝艰苦，不可不来复命，且闻见日久，则渐至忘漏，故予命撰进日记，何可遽归？情可恕也。”<sup>50)</sup>

吏曹判书洪贵达与兵曹判书韩致亨皆认为崔溥留京八日是为了奉命撰著《漂海录》，“非故留也”，因此“其情可恕”。

成宗24年4月17日，成宗在听完弘文馆直提学宋軼有关司宪府再次弹劾崔溥的启奏后，下令扩大朝中对此事的谈论范围。《成宗实录》中记载：“传曰：‘尔等言是也，予将广议。’三日之后(4月20日)，直提学宋軼等人向成宗上奏朝中大臣的讨论意见。《成宗实录》中记载：“馆中共议云：‘崔溥留连，非其心也，事涉暧昧，故啓之。’今宪府驳臣等庇护僚友，请避嫌。”可以看出朝中大臣(“馆中”)亦不认可司谏院与司宪府对崔溥的弹劾，认为“崔溥留连，非其心也。”对崔溥留京八日撰著《漂海录》以致造成所谓“不即奔丧，其大节已失”之举表示理解。在司谏院与司宪府看来，“馆中”同僚有“庇护僚友”之嫌疑，因此宋軼等人向成宗提出回避的请求。而成宗的答复是：“勿避。”二字简单，却表明了成宗肯定崔溥的坚定立场。

另外，撰著《成宗实录》的朝鲜史官，通过纪事之后的评语(“史臣曰”)对此发表了看法。如《成宗实录》19年6月14日的记载中，使臣在记载完崔溥还至京师、成宗命其撰著《漂海录》、并下令赏赐等事后，有如下的评述：“史臣曰：‘溥若于此时辞谢，请丧丧觐母然后撰集日记，则上必从之，人无间言矣。今不能所以招后日之议也。然以是为身累则过矣。’”又如，《成宗实录》19年6月22日的记载中，使臣在记载崔溥完成《中朝闻见日记》与承政院奏告请赐崔溥马匹以利其返乡之二事后，使臣有如下的评述：“史臣曰：‘溥之还，上悯其艰楚，命撰日记以进。溥留青坡驿数日，故旧有往吊者，溥不以初丧

50) 《成宗实录》第265卷，成宗24年4月12日。

受吊时，引接谈话，叙己漂泊艰关之状。以此致谤。”在撰著《朝鲜王朝实录》的史官看来，崔溥先撰书后返乡奔丧之举，为后来招来司谏院与司宪府的弹劾埋下伏笔。另外，由史臣的春秋笔法(如“招后日之议”、“以此致谤”等语)，亦可看出使臣对于司谏院与司宪府的弹劾也持反对意见。

以上我们以《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为依据，对崔溥返回朝鲜之后因奉成宗之命撰著《漂海录》、而未能立刻返乡尽孝而遭到司谏院、司宪府的弹劾，以及成宗与除司谏院、司宪府以外的其他部门的官员(如承政院的吏曹判书洪贵达与兵曹判书韩致亨、直提学宋軼等，以及撰著《朝鲜王朝实录》的史臣对弹劾意见的反对态度进行了梳理。

## 2. 崔溥在戊午士祸中受到牵连

1498年发生的戊午士祸是朝鲜时期四大士祸之一，戊午士祸实际上是士林派与守旧派之间政治斗争的结果。朝鲜成宗时期，岭南士林派领袖金宗直得到重用。金宗直及其周围士林派人士对守旧派势力造成威胁，士林派与守旧派形成对立之势。金宗直弹劾守旧派成员柳子光诬告南怡一事，使柳子光怀恨在心。又，金宗直的门人金駟孙在春秋馆任史官期间抨击李克墩的不当言行，激起了李克墩不满。柳、李二人遂联手对金宗直与金駟孙实施报复。1498年为编纂《成宗实录》设立了实录厅，李克墩被任命为实录厅堂上官。李克墩以之前金宗直所写的《吊义帝文》一文有抨击世祖篡夺端宗王位之嫌疑，告知了柳子光。柳子光联合卢思慎、尹弼商等人向燕山君报告此事，燕山君以此为契机对早已心怀不满的士林派人士金駟孙施行审问。审问之后，燕山君下令对彼时已经去世的金宗直被“剖棺斩尸”，金駟孙、权五福、权景裕、李穆、许磐等人被“凌迟处斩”，姜谦等人被没收家产。表沿沫、洪瀚、郑汝昌、姜景叙、李守恭、郑希良、郑承祖等人被杖责一百大板并流放三千里。金宗直的门人李宗准、崔溥、李鼈、李胄、金宏弼、朴汉柱、任熙载、康伯珍、李继孟、姜浑等人被视作金宗直党徒，亦被杖责、并赐还乡。甚至连柳珣、尹孝孙、金铨等史官亦因所谓知情不报之罪，被免去官职。洪贵

达、赵益贞、许琛、安琛等人亦因知情不报之罪降职。<sup>51)</sup>

《海东野言(二)·戊午史祸事迹》中对于戊午士祸的经过记载甚详。崔溥因系金宗直门人故，亦被“决杖八十，远方付处。”《戊午士祸事迹》中载：“李宗准、崔溥、李鼐、李胄、金宏弼、朴汉柱、任熙载、康伯珍、李继孟、姜浑，俱以宗直门徒，结为朋党，互相称誉。或讥议国政，谤讪时事。熙载李胄决杖一百，极边附处。宗准、崔溥、李鼐、宏弼、汉柱、伯珍、继孟、姜浑，并决杖八十，远方付处。而流人等并定烽燧庭炉干之役。”

以上我们对崔溥回国后的遭遇进行了梳理：一、崔溥回国后遭到司谏院与司宪府的弹劾；二、在戊午士祸中受到牵连，被杖责并流放。

### 3. 南九万、金履万等人对崔溥《漂海录》的接受

在检索朝鲜文人对崔溥《漂海录》之接受相关材料时，笔者发现以阅读崔溥《漂海录》命题诗作四首，皆为七绝，具体如下：

沈义《读崔斯文溥〈漂海录〉》：

昂藏忠胆正峥嵘，生死沧溟一棹轻。点检纪行成独梦，枕边犹傍落潮声。（《大观斋乱稿》）

南九万《看崔溥漂海录》：

饱尽千危历万难，几重沧海几重山。早知不免清流祸，鱼腹藏身较似安。（《药泉集》第一）

金履万《题锦南漂海录二首》：

51) 以上对戊午士祸经过的梳理，参考了知识百科。<https://terms.naver.com/entry.nhn?docId=1094978&cid=40942&categoryId=31778>

其一：瓮里醜鷄核里虫，鸭江衣带限西东。一从漂海书成后，万里山川指掌中。

其二：弘治礼乐极彬彬，漂海书中拾一尘。兰台容有揄扬语，百世公言在野人。（《鹤臯先生文集》卷之三）

沈义的诗歌内容尚看不出诗作中与崔溥遭弹劾事的关联。不过，南九万《看崔溥漂海录》与金履万《题锦南漂海录二首》二诗与崔溥遭弹劾事的关联却十分明显。南九万诗的第一联回顾了崔溥在海上经历漂流时的艰难，第二联则联系崔溥返回朝鲜后的经历发表感慨。柳希春《锦南先生事实记》载：

“戊午七月，史祸起。以公及申从濩等八人，尝以所著文科次于占毕斋。燕山命搜其家。公独以家藏《占毕斋集》受拷讯，寻杖流端川。公既至谪所，处之坦荡荡。至甲子十月，燕山命拿致诏狱。将行刑前夕，金公詮、洪公彦弼等，以轻繫同处，以酒饯。先生一一受飲，诀别丁宁，神色不乱，扬扬如平时。”

崔溥在1488年返回朝鲜之后，自成宗23年的15日至24年4月13日，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先后四次遭到来自司谏院与司宪府四位不同官员的弹劾。但由于成宗与承政院官员的维护，对崔溥的弹劾失败。由“不免”二字来看，南九万《看崔溥漂海录》诗句“早知不免清流祸”中所谓的“清流祸”，所指涉的当不是司谏院与司宪府对崔溥弹劾事，而是1498年的戊午士祸。南九万诗中第二联“早知不免清流祸，鱼腹藏身较似安”中，出句指的是崔溥在戊午士祸中受到牵连被流放事，对句中的“鱼腹藏身较似安”指得则是崔溥的海上漂流经历。在南九万看来，早知道返回朝鲜后会因戊午士祸受到牵连而死，还不如死在海上漂流过程中。可见，南九万《看崔溥漂海录》中对崔溥《漂海录》的接受，是与崔溥返回朝鲜后的遭遇结合起来进行的，对崔溥卷入士祸中表达惋惜之情。

崔溥《漂海录》中详细记录了在中国境内的行程，金履万《题锦南漂海

录二首》第一首第二联“一从漂海书成后，万里山川指掌中”，指出了崔溥《漂海录》对于当时朝鲜人认识中国“万里山川”的帮助作用。第二首第一联“弘治礼乐极彬彬，漂海书中拾一尘”，对《漂海录》中崔溥展示了朝鲜人的“礼乐”高度称赞。第二联“兰台容有揄扬语，百世公言在野人”，这里的“揄扬语”指的可能就是崔溥1488年返回朝鲜后，朝鲜朝廷围绕崔溥“不即奔丧”之举是否“大节已失”展开的议论。上文中提到，成宗先后于24年4月17日与4月12日先后两次下令朝中就此事展开讨论。<sup>52)</sup>成宗对于弹劾方(司谏院与司宪府)，与弹劾反对方(承政院)的意见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因此金履万在第二联出句中有“兰台容有揄扬语”的说法。对句“百世公言在野人”间接表明了诗人自己对此事的立场：在金履万看来，崔溥“不即奔丧”是否“大节已失”，世人自有评论。我们不难推测，金履万亦不认为崔溥“不即奔丧”是失大节之举。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金履万对崔溥《漂海录》的接受，也是结合崔溥返回朝鲜后的经历来进行的，认为崔溥的“不即奔丧”并非失大节之举。

## VII. 结论

朝鲜时期,在难以深入中国南方腹地考察的情况下,崔溥因意外的漂海事件获得了与中国南部零距离考察的机会。崔溥在《漂海录》中详细的记述了在中国的见闻,该书由于这一特质,在朝鲜时期前后起码经历六次刊行,拥有大量读者。本文对朝鲜时期崔溥《漂海录》的读者及其评论资料作了系统的收集整理。并选取其中四个方面,对朝鲜人接受崔溥《漂海录》的思想立场进行了考察。

第一,崔溥在中国期间,坚守儒家礼仪,展示了朝鲜“礼仪之邦”的形

52) ①成宗24年4月17日记载,成宗在听完弘文馆直提学宋軼有关司宪府再次弹劾崔溥的启奏后,下令扩大朝中对此事的谈论范围。《成宗实录》中记载:“传曰:‘尔等言是也,予将广议。’”②《成宗实录》成宗24年4月12日记载:传于承政院曰:“崔溥事,议吏、兵曹以啓。”

象。这些在《漂海录》中皆有相关记载。成宗从“华国”的思想出发，对崔溥漂流中国及其《漂海录》做出高度肯定，认为崔溥“跋涉死地，亦能华国”，对崔溥先后给与三次赏赐。成宗对崔溥《漂海录》的接受是从“华国”的思想立场出发的。

第二，经过17世纪的萌芽，到了18世纪，朝鲜实学迎来鼎盛时期。李睟光、李圭景、丁若镛是朝鲜实学家的代表，三人从“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出发，先后编纂了各自实学代表性著作：《芝峰类说》《五洲衍文长笈散稿》《与犹堂全书》。在这三部书中数次引用了崔溥《漂海录》中的相关内容。实学家对《漂海录》的引用，少有主观性评述，只是将崔溥《漂海录》用作编纂百科全书式实学著作的资料。这侧面反映了崔溥《漂海录》一书的知识性与实用性。

第三，康熙六年(1667)，福建人林寅观等九十五人在往日本途中漂流到朝鲜济州岛大静县海域，朝鲜地方官经过逐层审问，最后上报朝廷。以赵宗著为代表的朝鲜士人本着向明朝报恩的思想，反对将漂流民押送还清，而朝鲜朝廷迫于与清廷的外交关系，不顾士人反对，选择了移送还清。此事引起士人心灵极大震动，不少人写作了大量与此事件相关的诗文，成海应将这些诗文集集成书，是为《丁未传信录》，其中就收录了赵宗著写给朝鲜国王的《请放流人疏》。文中将崔溥漂流到明朝受到明朝皇帝的多次恩恤与优待，与林寅观等被朝鲜“押送”还清进行对比，体现了作者的对明报恩思想。

第四，崔溥在返回朝鲜后，先后经历了来自司谏院与司宪府的四次弹劾，九年之后又在戊午士祸中受到遣连，被杖责并流放端川，后被赐死。南九万、金履万等人以阅读崔溥《漂海录》为题的诗作，即结合崔溥返回朝鲜后的遭遇展开。南诗中结合戊午士祸，评述崔溥的漂海经历，对崔溥卷入戊午士祸表示惋惜。金诗中结合司谏院与司宪府对崔溥的弹劾，以及成宗与承政院对崔溥的维护，在评述崔溥《漂海录》与漂海经历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金履万看来，崔溥“不即奔丧”之举并非失节。南、金二人对《漂海录》的阅读与接受皆是结合崔溥返回朝鲜后的经历展开，一关涉否有辱名教之争，一关涉朝鲜时期士林派与勋旧派的政治斗争。



崔溥《漂海录》被誉之是可与《马可波罗游记》以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相媲美的三大游记杰作之一。朝鲜时期,其刻本流传到日本,日本江户时期又先后出现两种日文译本。在古代东亚,崔溥的《漂海录》是一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韩国汉籍。对于该书在朝鲜时期的韩国以及在江户时期的日本的流传、阅读与接受的研究,能进一步深化对《漂海录》的研究;同时,对于朝鲜汉籍在东亚流传之研究亦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仅对该书在朝鲜时期的接受情况作研究,希望将来也能对该书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传情况亦做一番探讨。

### <参考文献>

- 심경호, 《조선시대의 한문학과 시경론》, 일지사, 1999.
- 이지영, 〈최부 《표해록》 언해본의 이본 고찰〉, 《국어국문학》 178집, 2017.
- 유춘동, 〈새 자료 서강대 소장 최부(崔溥)의 《금남표해록》 한글본 연〉, 《열상고전연구》 53집, 2016.
- 정민, 〈16·7세기 조선 문인지식인층의 江南熱과 西湖圖〉, 《고전문학연구》 22집, 2002.
- 朴元焄, 《崔溥〈漂海录〉校注》,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 朴元焄, 《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 朴羲成, 《紀年便考》,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1996.
- 葛荣晋主编, 《韩国实学思想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杨雨蕾, 〈明清时期朝鲜朝天、燕行路线及其变迁〉, 《历史地理》 第21辑, 2006.
-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 db.itkc.or.kr
- 朝鲜王朝实录数据库: sillok.history.go.kr

## &lt; Abstract &gt;

Cui Pu(崔溥)'s *Piaohailu*(《漂海錄》) was published at least six times in Joseon Dynasty. The book had a large number of readers. From Chengzong(成宗)—the king of Joseon, court ministers to ordinary scholars, many readers left different kinds of poetry and article materials about quoting, commenting on or just referring to *Piaohailu*, which provides us an important basis to study the acceptance of Cui Pu's *Piaohailu* in Joseon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these material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cceptance of *Piaohailu* from four aspects: First, Joseon's king Chengzong viewed Cui Pu's experience of drift incident and his *Piaohailu* from the standpoint of winning glory for the country(華國).Second, the pragmatists paid attention to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ability of *Piaohailu*, and used it as a reference for compiling practical works. Thirdly, Zhao Zongzhu(趙宗著) and other scholars of Joseon Dynasty compared Cui Pu's preferential treatment in Ming Dynasty with Lin Yinguan(林寅觀)'s unfair treatment in Joseon. It reflects their thought of recompenses to Ming Dynasty. Fourthly, Nan Jiuwan(南九萬) and Jin Lvwan(金履萬)'s acceptance of *Piaohailu* combined with Cui Pu's experience after his returning to Joseon. Their poems showed their regret for Cui Pu's involvement in the Wuwu scholars' calamity(戊午士禍). Additionally, the recipient show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s the dispute about Ming Jiao(名教) triggered by the event of Cui Pu's writing *Piaohailu*.

Key Words : 崔溥(Cui Pu), 《漂海錄》(*Piaohailu*), 朝鮮時代(Joseon Dynasty), 接受(acceptance), 思想立場(ideological stand)